

中苏理论分歧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孔寒冰

在新中国对外关系方面，就复杂性和重要性而言，中苏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因为它融党际关系、国家关系以及领袖交往于一体，还因为它对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而在中苏关系里，出现在1956—1964年间在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又格外醒目。它不仅彻底改变了国际共运的世界格局和中苏关系的走向，而且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全方位的负面效应，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对中苏理论分歧进行总体的研究和评价，绝非易事，本文只探讨它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若干重大影响。

一

新中国在成立伊始就奉行的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于1949年底至1950年初长达两多月的莫斯科之行以及在这期间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把中苏之间的关系罩上了一层“亲密无间”的光环。然而，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心存的芥蒂，两国在各种条约和协定谈判过程中的利益冲突^①，尽管没有公开，但确实实实在在地在光环的后面又遮上了一层阴影。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共产国际之间的恩恩怨怨，两国革命道路与经验的不同，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国所处的环境差异，中苏的“蜜月”关系注定不会天长地久。

中苏关系的裂痕开始出现于1956年，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和由此展开的争论便是载体，从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论无产阶级专政和历史经验》到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持续长达8年之久。其走向是由围绕个别问题展开同志式的讨论到就一系列问题进行的公开论战，最终导致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并进入冲突与对峙的时期。

二

中苏在理论上的分歧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首先，它中断了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方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渐严重，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斯大林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而这又是由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引起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犯了严重的错误，如大搞个人迷信，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党就开始着手纠正和批判他的错误，在做了大量的工作基础上，赫鲁晓夫才在二十大上受中央的委托作了这个报告。公正而论，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全面地评述斯大林的生平功过事

迹”^②，只是论及斯大林个人迷信给苏联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种种危害，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总的说来，是符合实际的，对于打破对斯大林的神话和解放人们的思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在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历史经验》（简称《一论》）一文中和在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此都给予肯定^③。不过，与此同时，中国党也强调对斯大林应当作出全面的评价，特别是要充分肯定他的功绩^④。这说明了两党在对待斯大林问题的角度和态度上的差别。正如当时一位在华的苏联专家看过这篇文章的译文之后说的那样，“这是批评我们的”^⑤。

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一时在东欧乃至全世界共产党人当中引起较大混乱，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掀起了轩然大波并触发了动乱^⑥。与此同时，西方则借机攻击斯大林、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一文就改变了对批判个人迷信的态度，其中最明显的是，《一论》充分肯定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并且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而《再论》不再强调反对个人崇拜，与反对教条主义相提并论的又提出反对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⑦。因而就形成了“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修正主义”公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个人迷信从1957年开始转变成个人迷信的推崇和盛行，党内生活不正常起来，逐渐形成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斗争，将党内外一大批敢于秉笔直言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实际上，言路从此阻塞。1958年3月，毛泽东提出两种个人崇拜，其中之一是正确的，即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崇拜。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已

萌生和发展的个人崇拜开了绿灯”^⑧。于是，从“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到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⑨，再到小红书、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一发不可收拾。

中苏理论分歧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它进一步将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看法推向极端。

1956年的中共八大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曾作出过正确分析和决断，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⑩。然而，一年之后，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却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⑪，接着，在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⑫。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波匈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之外，还与中苏争论有关。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和资本主义长期地和平共处并且通过经济竞赛来决出胜负；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强大，现代战争不是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⑬，这就是所谓的“三和路线”。中国党虽然不否认和平共处，但更为强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

是西风压倒东风”；虽然不否认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更为强调暴力革命；强调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有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不难看出，苏联突出和平与共处，中方则看重对立和斗争。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认识上的差别同样反映在对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看法上面。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提出，随着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剥削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全体人民的国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⑭。这种完全淡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引起了中国党的极大愤怒。在争论中，中方认为苏共二十二大纲领“是保存和恢复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纲领”，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⑮。尖锐的理论分歧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向思维。“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⑯。

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已经很明确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指导思想。文章说，毛泽东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和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基础之上，提出了系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政策，其中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

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⑰。

中苏理论分歧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政治上的这两方面影响结合到一起，再加上其他因素，便造成更大的后果，那就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对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1956—1966年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⑱。

三

在论及中苏论战的后果的时候，我国学者中有这样一种看法：“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领导本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反对一个中心、一种模式、一条道路，这种生动的团结的局面，不能不说是这场论战的一个最显著的收获”^⑲。其实，从经济建设上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没能冲破苏联模式，“行政的、集权命令式的计划经济犹如如来佛的手掌，实行的经济改革的种种举措，就象孙悟空翻筋斗，翻来翻去，最后仍在如来佛的手掌上”^⑳。至于中国，由于这场论战，更是将苏联模式推向极端，这就是中苏理论分歧对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影响。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经济方面的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优先发展重工业；指令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排斥市场调节；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战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确

立了这种经济模式。尽管对于这些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在一定时期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这种高度集中的、完全排斥市场的运行机制极大的限制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先是南斯拉夫，后是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改革这种过于僵化的体制。这样一来，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对其的改革，成为中苏争论的又一焦点。

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模式，1956年底发表的《再论》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5条共同规律，并表示反对企图避开这些规律的“修正主义者”^②。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更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和反对修正主义，这些都被写进了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当中^③。坚持要走自己路的南斯拉夫不但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相反于1958年3月公布了新的党纲草案，7月又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南共联盟新的党纲和党代会除了反对苏联大党大国主义之外，重要的内容就在于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措施。于是从1958年5月开始，在中苏两党率领下，世界上几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开展了一场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运动。

由于在“三和路线”、反对个人迷信甚至在经济方面的某些改革上，南斯拉夫与苏联没有分歧或者分歧不大，苏联在批南的过程中，注意同南斯拉夫保持和改善国家关系。再加上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也作了某些经济体制调整和改革，如下放管理权和扩大企业自主经营，强调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进行工资制度的改革和用奖励的办法刺激劳动热情等等，所以，中国党在越来越严厉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同时，也把矛头对准了苏共，在公开论战时，中国党发表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第三篇的题目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根据这篇文章，南斯拉夫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经济方面的标志是：存在着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农村没有触动富农经济和放弃集体化方针，搞“工人自治”冲击了公有制经济，取消了统一的计划经济，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手段，鼓励竞争等等^④，搞这种“修正主义”的不仅是南斯拉夫，也有苏联^⑤。

今天看来，无论是南斯拉夫还是苏联，所做的只是对苏联经济模式的细微调整，没有什么力度，更谈不上根本上改变苏联模式。但是，由于把这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修正主义”，中国党在严厉批判的同时，朝相反的、也就是更加强化苏联模式的方向发展自己的经济。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刮“共产风”，推行高指标，片面发展重工业，……无一不是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实际行动。

面对着工业与农业之间和生产与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管理混乱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现实，中央从1960年8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纠正了一些极左的做法，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中苏论战的深入和把阶级斗争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在调整过程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都成为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国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罪状，如“三自一包”^⑥。不仅如此，批“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排斥多种经济形式，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和排斥按劳分配等极“左”做法，在“文革”期间达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总之，从1957年到改革开放之前，“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结果，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非但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相反搞得比苏联模式更加集中和僵化。^⑦

四

中苏理论上的分歧还影响到中国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等方面。比如，在军事战略方面，由于在“三和路线”上的尖锐对立，中国党认定有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②。因此，在强调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同时，中国自身也立足于早打、打大仗、打核战争，将经济发展步入准战时的轨道，使产业布局 and 经济发展国防化^③。又如，在外交战略方面，“由于中苏交恶的阴影笼罩，导致‘文革’时期中国的外交思维和外交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隔，对苏联和东欧的政策和策略在某些方面缺乏灵活性和调整余地”^④。凡此种种，本文不再多言。

从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来看，中苏理论分歧及其争论给我们留下的最大教训是一定要正确认识修正主义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修正主义是引起争论最大甚至造成革命队伍分裂的一种思潮。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观点被称为老修正主义，南斯拉夫铁托的思想和苏联赫鲁晓夫的主张被称为现代修正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中国党在同苏联党争论与论战中高举的一面旗帜。然而，什么是修正主义，我们却没有弄清楚。

今天回过头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南斯拉夫和苏联进行的有限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绝对不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当时我们认定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引入一点点市场机制，给僵硬的模式注入一点点活力，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对此理论上加以严

厉的批判，实践上反其道而行之，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各方面巨大的负面影响，就毫不奇怪了。

没有搞清什么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个共产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应该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把马克思100多年前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西欧的模式生搬硬套到东欧或中国，决不是坚持更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作茧自缚，倒霉的最终还是自己。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误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狂热宣扬，把对根据具体情况对马克思主义某些更改认定是修正主义，大加鞭挞，这就是1956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悲剧性发展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这也是战后国际共产主义中最大的理论误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开始逐渐从这个误区中摆脱出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再也不是一面哈哈镜，映照出来的再也不是歪曲了的形象了。

注释：

- ① 参见《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2页；邱静：《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袁宝华：《赴苏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1950年中苏会谈问题争论》，《党史资料》1996年第4期。
- ② [苏]尼·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法]布兰科·拉奇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53页。
- ③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
- ④ 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 ⑤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

- 版社 1991 年版, 第 60 页。
- ⑧ 参见姜琦、张月明:《东欧三十五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246、267 页。
- ⑦⑮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第 4、38 页。
- ⑧⑨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2—33 页。
- ⑩⑰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5、20、21—22 页。
- ⑪⑫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第 461、417 页。
- ⑬ 参见《赫鲁晓夫言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年中文版, 第 5 卷, 第 37—41 页。
- ⑭ 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 《新华月报》1961 年第 12 期, 第 162 页。
- ⑯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第 58—59 页。
- ⑰ 陈明显主编:《新中国四十五年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52 页。
- ⑱ 赵乃斌、朱晓中主编:《东欧经济大转轨》,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0 页。
- ⑲ 《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29 日。
- ⑳ 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9—11 页。
- ㉑ 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第 5—22 页。
- ㉒ 参见《苏修“经济改革”文集》出版说明、编者序言, 三联书店 1975 年中文版, 第 1—16 页。
- ㉓ 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67 年 8 月 15 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万岁》,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 第 299—307 页。
- ㉔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新华月报》1984 年第 10 期, 第 17 页。
- ㉕ 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第 28 页。
- ㉖ 参见王明图:《毛泽东的忧虑——固权安邦·拒腐防变的理论与实践》,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15—219 页。
- ㉗ 李丹慧:《中国分裂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 《党史研究资料》1997 年第 1 期。